

儒家思想“礼”在中韩敬语法中的应用比较研究

路 颖

天津外国语大学亚非语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本文探讨了儒家思想中“礼”的概念及其在中韩敬语法中的体现与应用。通过文献分析和对比研究,揭示了“礼”文化对中韩语言敬语系统的深刻影响。虽然中韩敬语法都根植于儒家“礼”的思想,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使用规则和社会功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敬语法相对简化但仍保留等级观念,而韩国敬语系统则更为复杂和制度化。这些差异反映了“礼”文化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演变。本研究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礼, 敬语, 中韩比较, 语言文化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Ritual” in Confucian Thought and Korean-Chinese Polite Language

Ying Lu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une 16,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ritual” in Confucian thought and its manifest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Korean-Chinese polite languag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it reveal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ritual” culture on the polite language systems of Chinese and Korean. Although both Chinese and Korean polite languages are rooted in the Confucian “ritual” though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ecific expression forms, usage rules,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 Chinese polite language is relatively simplified but still retains the concept of hierarchy,

while the Korean polite language system is more complex and institutionalized. These differences reflect the adaptive evolution of the “ritual” culture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onfucian Thought, Ritual, Polite Languag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儒家思想作为东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之一，对中韩两国的语言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礼”作为儒家五常之一，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渗透到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在语言表达上形成了独特的敬语系统。中韩两国虽然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但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敬语系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本研究旨在探讨儒家“礼”思想在中韩敬语法中的具体体现，分析其异同点及背后的文化逻辑，为理解中韩文化提供新的视角。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研究借鉴社会语言学中的礼貌理论(Brown & Levinson, 1987)作为分析基础。Brown 和 Levinson 提出的“面子保全论”将礼貌行为视为一种理性的社会交际策略，个体通过积极礼貌和消极礼貌来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需求[1]。这一理论为理解敬语现象提供了普遍性的分析工具。与此同时，本研究也注意到该理论基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语境的局限性，因此将结合顾曰国提出的汉语礼貌原则以及韩国学者对韩语敬语文化特性的相关研究，构建一个适用于东亚文化语境的分析框架[2]。

本研究还参照 Leech 的礼貌原则中的“贬己尊人”准则[3]，以及顾曰国所归纳的汉语礼貌四大要素——尊重、谦逊、态度热情、文雅，本文将“敬语系统”界定为包含以下四个构成要素的综合体：(1) 称谓系统——包括对称与谦称；(2) 敬谦词汇——包括敬辞词素与谦辞词素；(3) 形态句法——指语法层面强制性的敬语形态；(4) 语用策略——包括句式选择、语气调控等语用层面的礼貌表达方式。以此四要素为分析框架，本文将对中韩敬语进行逐项比较。

在文献基础方面，现有中韩敬语比较研究多集中于语言形式的差异描述，对“礼”文化在敬语系统中深层作用机制的理论阐释仍显不足。谢昀廷通过对比中韩敬语的词汇与形态特征，指出两国敬语差异源于各自社会结构的不同[4]；周杨从中韩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分析了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5]；潘畅和比较了日韩儒家文化背景，强调了“礼”在两国社会中的不同实践路径[6]；史丽萍从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的宏观视角，对两国文化心理差异进行了系统梳理[7]。上述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多数研究侧重现象描述而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且对敬语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探讨尚不充分。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以四要素分析框架为纲，系统比较中韩敬语的异同，并进一步探讨差异背后的文化心理根源，以期推进该领域的理论深度。

2. 儒家思想中“礼”的概念与内涵

“礼”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将“礼”提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和个人修养的重要准则，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强调“礼”不仅是外在行为规范，更是内在

道德修养的体现。孟子进一步将“礼”视为人性四端之一，认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突出了“礼”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在儒家经典《礼记》中，“礼”被系统化为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涵盖了个人行为、家庭伦理、社会交往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其核心功能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通过区分尊卑贵贱来维持社会秩序。这种等级观念深刻影响了亚洲社会的语言表达方式，促使了敬语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礼”文化强调“自卑而尊人”的交际原则，这种双向的尊重观念使得敬语不仅是下级对上级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普遍的人际交往礼仪。正如《礼记》所言：“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种互敬互让的精神构成了中韩敬语文化的共同基础。

3. 中国敬语系统中的“礼”文化体现

汉语敬语系统源远流长，它是儒家“礼”文化在语言层面的重要投射。“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秩序与社会哲学，而敬语正是这一秩序在言语交际中的制度化体现。

1) 称谓系统

早在先秦时期，汉语敬语体系便已初具规模。周代宗法社会的等级结构催生了较为系统的语言等级制度。在称谓层面，形成了对天子称“王”“君”“陛下”，对诸侯称“公”“君侯”，对卿大夫称“子”“夫子”等一套等级称谓系统。在自称层面，则形成了以“臣”(对君)、“仆”(对人)、“寡人”(君主自谦)、“不穀”(诸侯自谦)等为代表的谦称系统。

这一时期敬语的使用与儒家“正名”思想密切相关。《论语·子路》中孔子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揭示了语言名称与社会位分之间的对应关系。正确的称谓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先秦敬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法礼制对言语行为的规范要求。

2) 敬谦词汇

在词汇层面，汉语通过选用特定的敬辞词素与谦辞词素进行构词，形成了一套丰富的敬谦词汇库。敬辞词素如“贵”“尊”“令”“高”“雅”“惠”“光”“拜”等，谦辞词素如“鄙”“拙”“敝”“愚”“寒”“贱”“小”“家”等。例如，“贵姓”替代“你姓什么”，“高见”替代“你的看法”，“拙作”替代“我的作品”，“拜读”指阅读对方作品，“惠顾”指对方光临。这种词汇层面的替换直接服务于“抬高对方、压低自我”的语用逻辑。需要说明的是，汉语在形态句法层面缺乏强制性的敬语标记——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成分不因交际对象的身份而发生形态变化，礼貌功能主要由词汇策略承载。

3) 语用策略

在语用层面，中国敬语的使用表现出高度的语境依赖性与灵活性。说话者需要根据具体的交际对象、场合、目的及双方的亲疏关系来动态调整礼貌程度。主要语用策略包括：句式选择上倾向于使用疑问句式(如“能否……?”“可否……?”)替代祈使句式以缓和语气；语气调控上倾向于通过语气词和语调的调节来降低指令的直接性；称谓转换上倾向于根据场合在正式称谓与非正式称谓间进行切换。

上述策略的灵活运用，最终指向儒家语用学的核心范畴——“得体”。这就要求说话者在语言表达上既要表达敬意，又要契合具体的时间、地点、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过分恭敬可能流于谄媚，恭敬不足则失于傲慢，唯有恰到好处方为“礼”之本义。例如，在家庭内部对长辈使用“您”是得体的，但在亲密友人之间过度使用敬语反而显得生分。这种对交际语境的精密考量，使中国敬语系统呈现出高度的情境敏感性。

4) 现代转型

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价值观念变革，传统的等级制

度被打破,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这一背景下,汉语敬语系统的外在形态发生了显著简化,人们在日常交际很少使用古代敬谦称谓(如“陛下”“大人”“在下”“贱内”等),第二人称单数“您”的适用范围也逐步收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礼”文化的消亡。相反,其核心精神在当代社会以“礼貌原则”“得体准则”和“职业伦理”的形态获得了延续与重构。在当代中国的商务谈判、政务公文、学术会议、教育课堂等正式场合,传统的敬语表达依然被系统性地使用。例如,商务函件中“贵公司”“贵方”的使用,政务场合中“莅临”“指示”的运用,学术交流中“拜读”“请教”的沿袭,均表明传统敬语已成为现代正式语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当代汉语敬语系统也在经历创造性的转型——网络时代新兴的“您”的泛化使用(如电商语境中对顾客的普遍尊称)、职场中“某总”“某工”等新型职务称谓的流行,以及公共服务行业“欢迎光临”“请慢用”等程式化敬语的普及,都是“礼”文化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的适应性演化。

4. 韩国敬语系统中的“礼”文化体现

韩国敬语系统同样是儒家“礼”文化在语言层面的深刻体现。然而,由于历史演进路径、社会结构变迁及文化心理倾向的差异,韩国敬语系统在形式特征、使用规范与社会功能上呈现出与中国不同的差异。

1) 称谓系统

韩语称谓系统较汉语更为复杂,体现了对社会位阶的精细划分。在对称方面,韩语拥有多层次的人称代词系统,如第二人称有“당신”(您,正式/夫妻间)、“자네”(你,对平辈或晚辈)、“그대”(你,书面/歌词)、“너”(你,非正式)等多个层级。在指称对方亲属时,韩语有专门的尊敬形式,如“아버님”(令尊)、“어머님”(令堂),与普通形式的“아버지”“어머니”形成对照。在谦称方面,韩语同样拥有一套自我谦抑的表达方式,如“저”为“나”(我)的谦称形式,用于正式或对长辈的场合。在职业和社会称谓方面,韩语广泛使用职务称谓(如“사장님”——社长、“선생님”——老师/先生)并附加敬语后缀“-님”以示尊重,这一后缀的使用范围远广于汉语中相应的敬称标记。

2) 敬谦词汇

在词汇层面,韩语拥有系统的敬语动词和敬语名词。当动作的施事为长辈或地位高者时,需使用敬语动词替换普通动词,例如“드시다”替代“먹다”(吃)、“주무시다”替代“자다”(睡)、“말씀”替代“말”(话)等。韩语还拥有一套独立的谦语词汇系统,用于贬低自身行为以抬举对方,如“봘다”为“보다”(见)的谦语形式、“드리다”为“주다”(给)的谦语形式、“여쭙다”为“묻다”(问)的谦语形式。在名词方面,与对方相关的事物需要使用敬语名词,如“성함”替代“이름”(名字)、“댁”替代“집”(家)、“생신”替代“생일”(生日)。

3) 形态句法

这是中韩敬语系统最核心的差异所在。与汉语不同,韩语的敬语已经语法化为一个高度系统化的形态句法范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主体敬语法(주체높임법):当句子的主语是需要尊敬的对象时,谓语动词或形容词词干后须附加主体敬语词尾“-시-/으시-”。例如,“선생님이 가십니다。”中的“가시-”为“가-”(走)附加“-시-”后的尊敬形式。

客体敬语法(객체높임법):当句子的宾语是需要尊敬的对象时,选用特定的敬语动词来体现对动作接受者的尊敬,如“모시다”替代“데리다”(带)、“봘다”替代“보다”(见)的谦敬用法。

听者敬语法(상대높임법):根据听话者的年龄、社会地位及双方亲疏关系,说话者需要从六个尊卑等级(하십시오체、해요체、하오체、하계체、해라체、해체)中选择相应的终结词尾。例如,同一内容“吃了吗”可依据对象分别表述为“드셨습니까?”(正式尊敬)、“드셨어요?”(半正式)、“먹었어?”(非

正式)等不同形式。

这种语法层面的固定形式意味着在韩语中,几乎每一个谓语的形态选择都受到交际对象社会身份的制约,这是汉语所不具备的系统性特征。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两种语言的类型学特征: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手段,因此礼貌功能主要由词汇和语用策略承载;而韩语作为黏着语,拥有发达的助词和词尾系统,为敬语的语法化提供了天然的语言结构基础。

4) 语用策略

韩语敬语在使用规范上表现出较高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特征。在韩国社会的初次见面场景中,交际双方通常需要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对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的判断选定合适的敬语层级,这一选择一旦做出便贯穿整个交际过程。韩语敬语的层级选择在跨代际、跨阶层交际中需要说话者持续进行社会定位与语码转换。例如,在与年长者交谈时始终维持高等级敬语,而在同龄朋友之间则可以自然切换到非正式语体。这种语用调适能力被视为韩语使用者社会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语用策略方面,韩语同样使用疑问句式、委婉表达等方式来缓和语气、表达礼貌。例如,使用“-실래요?”(要……吗?)替代直接祈使句“-하세요”(请做……),以更委婉的方式提出请求。然而,与汉语相比,韩语的敬语选择受语法强制约束的程度更高,说话者个体自主调节的空间相对较小。偏离既定的敬语规范不仅被视为不够礼貌,更可能被解读为对交际对象社会地位的误判或对双方关系的否定。

5) 社会功能与心理基础

在韩国社会,敬语的功能远超礼貌表达的层面,它构成了社会身份确认与关系定位的核心机制。韩语敬语的选择不仅是“如何礼貌地说话”的技术问题,更是“说话者与听话者是什么关系”的身份界定问题。尤其在职场、家庭、学校等存在明确位阶差异的场域,敬语的准确使用代表了社会成员的基本语言素养。

从心理基础来看,韩国儒家传统在历史进程中更侧重于“礼”的外在规范性与实践性。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将朱子性理学中的“礼”学系统性地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礼”从一种道德哲学转化为一种全民性的行为准则。在这种文化心理下,敬语的使用首先被视为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其次才是个体内在情感的表达。因此,韩语敬语表现出较强的形式化、标准化特征——即便在内心并未产生强烈敬意的情境中,语言形式上仍需遵循既定的敬语规范。这种“由外而内”的路径,与韩语中高度发达的听者敬语体系形成了互释:礼貌首先是一种社会义务,其次才是个体情感的表达。

5. 中韩敬语中“礼”文化应用的异同

1) 形式结构的差异

从语言形式看,汉语敬语更倾向于词汇层面的选择性表达,而韩语敬语则更倾向于语法层面的系统化编码。汉语的礼貌功能主要依靠词汇替代和语用策略来承载,缺乏强制性的形态标记;韩语则通过主体敬语词尾、听者敬语终结词尾以及敬语动词和名词体系,构成了一个多维度、语法化的敬语操作系统。这种形式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语言的类型学特征不同,而非文化重视程度的差异。

2) 使用规范的差异

从使用规则看,中国敬语更强调“得体”原则,具有较高的语境依赖性;韩国敬语则更为规范化和制度化,使用规则相对明确。中国敬语的使用允许说话者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较大的灵活调整,而韩国敬语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明确社会坐标的功能,其选择受到较为严格的语法和社会规范的制约。这种差异与两国对“礼”的实践方式有关:中国文化中的“礼”更强调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因此敬语使用具有较大的个体自主空间;而韩国文化中的“礼”更强调外在规范的遵从,因此敬语使用表现出更强的形式化特征。

3) 社会功能的差异

从社会功能看,在现代中国社会,敬语的核心功能是表达尊重与礼貌,维护交际双方的“面子”,其缺失通常只会被感知为“不够礼貌”;而在韩国社会,敬语的功能还延伸至社会身份确认与关系定位层面,不当使用敬语可能被解读为对对方社会地位的否定或对双方关系的误判。韩国社会敬语在身份界定方面的功能较中国更为突出。

4) 共同的文化根基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中韩敬语系统在核心理念上仍然高度一致。两者都体现了儒家“礼”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尊重他人、谦逊自持、以和为贵。无论是汉语的“贬己尊人”还是韩语的敬语层级体系,其共同的文化根源均可追溯至儒家“自卑而尊人”的礼义精神。在全球化背景下,两种敬语系统都面临着现代化与语言简化的挑战,但“礼”文化所倡导的基本价值观——通过语言表达对他人人格的尊重——仍然在两国语言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韩敬语系统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儒家“礼”思想在语言文化中的具体体现和适应性演变。研究发现,虽然中韩敬语系统在形式结构和使用规则上存在差异,但都深深植根于儒家“礼”文化的价值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礼”文化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而其共同点则体现了东亚文明的文化共性。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敬语系统面临着简化和变革的压力,但儒家“礼”文化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和社会和谐理念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敬语系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轨迹,以及如何创造性转化传统“礼”文化以适应现代交际需求。此外,中韩敬语比较研究也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 [1] Brown, P. and Levinson, S.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3085>
- [2] 顾曰国. 礼貌、语用与文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4): 10-17, 80.
- [3] Leech, G.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 [4] 谢昀廷. 跨文化交际中韩敬语对比研究[J]. 品位·经典, 2025(4): 63-65.
- [5] 周杨. 中韩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J]. 西部学刊, 2023(20): 82-85, 93.
- [6] 潘畅和. 日韩儒家文化背景比较[J]. 日本学刊, 2001(3): 89-105.
- [7] 史丽萍. 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